

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再审视*

——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视角的分析

洪甘霖 赵宗胤 钱文荣

摘要：本文研究引入心理账户理论探讨社会养老保险如何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并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区分缴费型与非缴费型两种养老金收入，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表明，领取缴费型养老金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没有显著影响，而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会显著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但对农地转出规模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基于心理账户理论的机制分析发现，相比于缴费型养老金带来的收入效应，非缴费型养老金能通过稳定农户的未来养老收入预期，使较低的养老保障水平对农地转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功能的替代关系并不成立，只有“临时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可以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本文既是对制度性养老与农地养老是否存在替代关系的再检验，也是基于心理账户理论视角对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农地转出决策的新分析。

关键词：养老保险 农地转出 心理账户 模糊断点回归

中图分类号：F321.1；F323.8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农地不仅是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作为一项重要的家庭财产承担着收入保障功能。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农地提供的保障功能尤为重要。农民依赖以农地为核心收入来源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在农地上的劳动获得就业收入或转出农地获得财产性收入以保障自身生计安全（姜长云，2002）。而不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不仅阻碍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进一步加剧农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问题。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项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的重要制度安

*本文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乡区域平衡发展理念下的土地制度综合改革研究”（编号：19ZDA088）和国家留学基金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Impact of the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Level on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s”（编号：202106320114）的资助。笔者感谢密歇根州立大学金松青教授和浙江大学何文炯教授对本文研究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钱文荣。

排，其主要目的是为老年居民提供规范的、有政府背书的社会养老保障。随着农村地区快速建立起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为主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国已于 2012 年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县域全覆盖^①。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 10.5 亿人。^②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21 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 5.55 亿亩，流转面积超过总承包地面积的三成^③。两者的快速增长似乎为社会养老保险替代农地养老保障功能提供了证据。

但是，农地流转市场并没有随着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提升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细碎化、农地撂荒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细致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新农保与农地转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徐志刚等，2018；Zhu et al., 2022）。但近期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显示，新农保对农地养老功能的替代关系只在部分情况下成立（钱文荣等，2022）。低水平的养老金收入效应实际上无法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甚至会阻碍农地转出的发生（汪险生等，2022）。为什么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存在如此大的分歧？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出现争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调查时间的差异导致研究结论出现不一致。一部分认为参与新农保可以显著促进农户农地转出的研究大多使用了政策颁布的早期数据，而另一部分认为参与新农保与农户农地转出不存在显著关系的研究则利用了政策颁布多年后的调查数据。二是缺乏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导致未能较好地解释养老金收入与土地转出的关系。多数研究试图从收入效应的视角证明新农保可以改变农户行为。但较弱的收入效应使得新农保对农户的生产和消费决策几乎不存在显著影响。大部分文献认为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可以改变农户的主观心理预期，从而影响其农地流转决策（徐志刚等，2018），但是鲜有研究能提供这方面的实证证据。

除了在研究数据的使用和理论机制的分析层面存在分歧，绝大部分文献还忽视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处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其养老金领取条件也存在差异。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初期，达到领取门槛年龄的老年人无需缴纳参保费即可领取养老金，而未达到门槛年龄的老年人需要缴纳参保费方可在满足条件后领取养老金^④。虽然两者的可领取金额差异不大，且同样是由政府每月发放，但结合农地流转决策中农户主观心理预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否需要缴纳参保费”的行为差异很可能在农户计算预期收入与当前参保成本之差时，影响其对未来养老福利的主观心理判断，从而进一步影响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塞勒（Richard H. Thaler）于 1985 年提出的心理账户理论被普遍应用于心理因素影响行为决策的研究。尽管该理论多被用于消费和金融部门来解释人们的实际行为与传统理性人假设的偏离，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注意到其在农户行为决策研究中的应用潜力。例如，Zhang

^①资料来源：《2013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https://www.gov.cn/test/2013-03/19/content_2357136.htm。

^②资料来源：《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5 亿人》，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22/content_5738486.htm。

^③资料来源：《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2790 号建议的答复》，http://www.moa.gov.cn/govpublic/zcgggs/202109/t20210929_6378567.htm。

^④参见《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2/26/content_8656.htm。

et al. (2016) 发现农户对灌溉用水支付的决策会受心理账户的影响, Zeng and Herzfeld (2021) 认为农户的农业投资决策过程也符合这一理论判断, 郑沃林等 (2022) 则应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机理。

基于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仍然较低的现状, 以及现有研究关于社会养老保险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两者关系的争论, 本文将心理账户理论运用到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研究中, 利用 2019 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hina Rural Household Panel Survey, 简称 CRHPS), 通过断点分析、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方法, 在心理账户理论的整体分析框架内, 解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关系。同时, 基于政策获益条件在不同年龄段中出现的差异, 本文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获益人群进一步区分为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受益人, 并根据年龄断点将样本细分以重新审视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运用心理账户理论解释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 通过分析“微薄”的养老金收入为何能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决策, 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其次, 在研究对象上, 本文丰富了现有文献中关于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相关研究, 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回应了已有文献中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能否替代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疑惑和争论。最后, 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利用政策冲击的外生性构建断点识别策略和固定效应模型, 估计不同类型的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缓解了实证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二、政策背景

社会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是否需要个人缴纳费用来划分, 有缴费型和非缴费型两类, 大多数国家的全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属于缴费型。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则是一种政府无条件转移支付项目, 其主要作用是减少老龄贫困问题、提升老年居民幸福感。从概念界定的角度看,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存在着非缴费型部分 (郑秉文, 2020)。

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城乡居保”) 和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险项目构成, 而城乡居保是由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城居保”) 并轨而来。在经历了数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 中国政府于 2009 年在 320 个试点县率先实施了新农保制度, 并于 2012 年实现了全国县级层面的制度全覆盖, 随后在 2014 年完成了与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并轨工作^①。《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对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参保范围、基金统筹、领取条件等做出规定, 明确了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构成, 参保人的领取条件是年满 60 岁、累计缴费满 15 年。在实际操作层面, 不同地区

^①资料来源: 《2013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https://www.gov.cn/test/2013-03/19/content_2357136.htm; 《我国将于 2012 年底实现新农保、城居保全覆盖》, https://www.gov.cn/jrzq/2012-05/07/content_2131653.htm;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https://www.gov.cn/zwgc/2014-02/26/content_2621907.htm。

往往会在中央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的经济水平，设置不同的缴费和收入档次、政府补贴标准，并补充额外的统筹渠道（薛惠元和仙蜜花，2014）。

根据政策文件中关于“养老金待遇领取条件”的具体描述，新农保或城居保实施当年已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不用缴费并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其余参保人员则需按规定缴费方可在年满60周岁时领取养老金。特殊的制度安排不仅将城乡居保以非缴费型养老保险的方式快速覆盖现有的老龄人群，提升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水平和老年居民幸福感，还通过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吸收了养老资金，构建起可稳定发展的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池（见图1）。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两大目标与对应方案可被视为一个以年龄为断点的准自然实验，为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对传统农地养老功能的替代提供了有力的因果识别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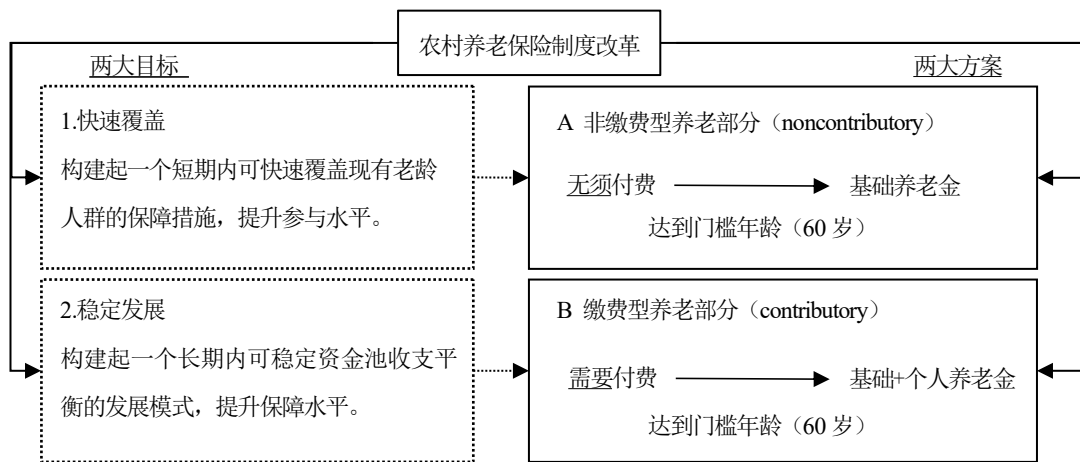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两大目标与对应方案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实现了快速覆盖和稳定发展，但仍存在着保障水平较低、资金池缺口逐年扩大等问题。有学者研究发现，多数参保人会选择最低的缴费档次，并在符合条件后领取最低水平的个人养老金（Huang and Zhang, 2021）。这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长期在低位发展，使得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与缴费型养老金的收入几乎都等于“基础养老金”部分。根据 Qian（2019）的研究，2015年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均养老金收入只有1228.8元，平均到每月只有100余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5%。如此之低的养老金收入，能否如已有研究所述，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值得从理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也是本文运用心理账户理论进行解释和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理论分析

通过对制度背景的梳理可以发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包含了缴费型养老与非缴费型养老两种实施方案，但两者在养老金收入层面又不存在显著差异。若社会养老保险能使个体的行为决策发生变化，那是否需要缴费可能是导致行为异化的关键。本文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心理账户理论，将内含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两种方案进行细分，以探究其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

(一) 心理账户理论

行为经济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解释人们的日常行为决策，是基于心理学理论对人们偏离理性决策的一种经济学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农户的行为往往被假定为理性的，但在一些外部环境冲击下，农户的实际决策又会与理论预期的不同。基于心理学理论的相关讨论有益于解释这类反常现象，其中心理账户理论常被用于解释收入与行为决策间的关系，是消费者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账户理论最早由 Thaler (1985) 提出，是指人们会将不同来源的收入进行编号，并将其存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同样数额但处于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某一具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本研究试图运用心理账户理论解释以下两点关切问题：其一，在养老金收入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类型养老保险方案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二，在整体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时，“微薄”的养老金收入是否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其中的影响机理又是什么。

表 1 以本研究关心的养老金收入为例，在老年人面临两期决策的假设基础上，展示了心理账户如何使同样金额的收入产生不同的心理收益。

表 1 同样水平的养老金收入在不同心理账户下的核算过程

	收入	缴费	进入不同的心理账户	心理收益
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	I	C	投资收入账户	$R_1 = I - C$
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	I	0	意外收入账户	$R_2 = I$

对于参与了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的老年人来说，他们需要先支付 C 的缴费成本才能获取 I 的收入。若将缴费成本 C 看作损失，养老金收入 I 看作收益，根据 Thaler (1985) 在构建价值函数时所提出的四项锚定参照原则之一，当面临的收益大于损失时，人们往往会将两者进行组合考虑。因此，将 $I - C$ 视为一个整体有利于交易过程中感知效用的最大化。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也与养老储蓄类似，因此可将缴费型养老金收入整体计入投资收入账户。而参与了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的老年人无须支付任何缴费成本就能获取 I 的收入，这与政府的无条件转移支付形式类似，因此可将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整体计入意外收入账户。Thaler (1999) 指出，当人们将不同收入进行心理账户的分析和比较时，效用最大化不再是最终目标，而心理满足的最大化成为指导人们行为决策的基础。因此，对行为人决策的合理性不能只以收入金额的数值来简单衡量，而要综合考虑人们的心理收益，即内心满足感。根据心理账户理论中的享乐主义原则 (Thaler and Johnson, 1990) 和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闲暇偏好假设 (Becker, 1965)，相比于投资收入账户，人们更乐于将意外收入账户用于消费以最大化自己的心理收益。这就使得同样的收入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对行为结果的影响不同。还是以表 1 为例，同样的养老金收入 I ，即使缴费成本 C 无限接近于 0，两者的内心满足感差异也会因心理账户归属的不同而产生远大于 $R_2 - R_1$ 的效果。在收入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时，心理账户会是驱动行为人决策异化的核心因素。

(二) 不同养老保险方案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图 2 解释了养老金收入被计入不同的心理账户，进而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逻辑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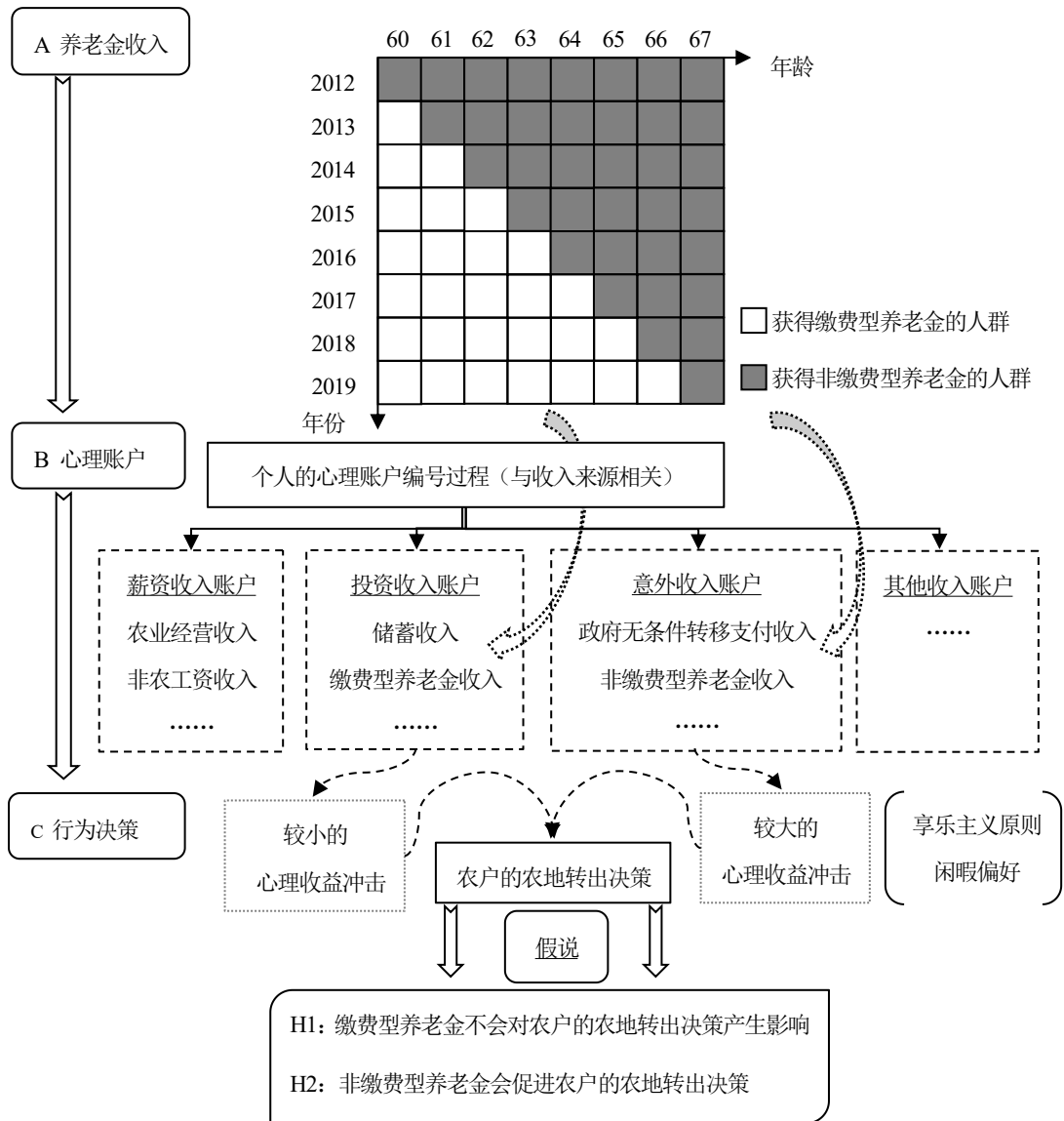


图2 养老金收入—心理账户编号—农地转出决策的理论逻辑

首先是农户在领取养老金收入上的异化过程。如图2的阶段A所示，2012年新农保改革县域全覆盖时，年满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以直接领取非缴费型方案的养老金（以黑色方块表示），当年并不会出现领取缴费型方案养老金的老年人（以白色方块表示）^①。相关政策中明确了非缴费型养老金受益人需要在新农保或城居保改革当年进行界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19年，即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的调查年份，只有67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才能领取到非缴费型养老金，而60~66岁的老年人只有资格参与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

^①这里假设新农保制度改革完成并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其实现县域全覆盖的2012年，该处理方法不仅便于理论和实证分析，也避免了设置为其他时间导致识别偏误的问题。

其次是农户将不同类型养老保险收入计入不同心理账户的编号过程。从前文对政策的梳理和心理账户理论的分析可知,在不同的领取条件约束下,参与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与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的老年人,其养老金收入的组成并不相同(见图1)。以2019年为例,67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只包含了“基础养老金”部分。因获取该部分收入并不需要支付额外成本,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将整体计入意外收入账户。而60~66岁的老年人所领取的缴费型养老金包含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是需付出一定的缴费成本的。因此,缴费型养老金收入将整体计入投资收入账户(如图2的阶段B所示)。虽然两类人群的养老金中都包含了具有政府全额补贴性质的“基础养老金”部分,但两类人群所面临的领取条件仍然因不同的养老保险方案而存在差异。因此,仍需缴费型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分类下,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视为整体进行分析。

最后是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如图2的阶段C所示,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农户在面临农地转出决策时,异化的心理账户会带来不同的心理收益冲击。根据前文的判断,同样金额的收入在意外收入账户和投资收入账户中对行为人后续决策产生的心理收益冲击程度不同(见表1)。基于享乐主义原则和闲暇偏好假设,2019年时年满67岁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受益人,因其养老金收入被计入意外收入账户,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心理收益冲击。该类老年人在时间资源的分配上会倾向于减少劳动、增加闲暇,从而促进农户转出农地;对于缴费型养老金受益人,较低的心理收益冲击,加上社会养老保险在理论上本就难以形成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替代,反而会使该类老年农户作出不转出农地的决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和H2供后续检验。

H1: 缴费型养老金不会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产生影响。

H2: 非缴费型养老金会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

通过验证假说H1,本文可以回应当前文献中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影响的争论,证实或证伪社会养老保险无法形成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替代。通过验证假说H2,本文可以解释为何较低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仍能有效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浙江大学CRHPS的2019年截面数据,该数据涵盖了来自全国29个省份的21815户家庭样本,包含了人口学特征指标、养老保险指标、农业生产经营指标和其他家庭特征指标等。CRHPS因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和更多有关农村家庭的调查信息,更贴合本文实证部分的研究需要。在2019年的CRHPS数据中,样本农户的户均耕地面积为7.44亩,接近户均7.8亩的全国统计数据^①,具有较好的农户代表性;有64.99%的受访户主参与了社会养老保险,这也与《中国统计年鉴2022》中公布的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数据较为接近^②。根据现有研究中对断点数据的处理方

^①资料来源:《图表:全国98%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3/01/content_5369810.htm。

^②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

法 (Zhu et al., 2022), 结合理论分析部分对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受益人群的年龄划分标准, 本文选取了户主年龄范围在 54~73 岁, 且不在 60 岁和 67 岁断点处的农村家庭进行分析。在剔除了居住在城镇地区的农村家庭和没有承包农地的家庭后, 本文最终获取的观测值总数为 7514 户。

(二)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1. 核心变量。为研究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情况和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作为核心指标。参考这一领域中已有文献的做法 (钱文荣等, 2022), 本文设置了“是否转出农地”和“农地转出面积”两个变量用于代理农户的农地转出情况。“是否转出农地”为哑变量, 由户主在 CRHPS 问卷中关于“去年, 您家耕地的经营权是否转给他人或机构?”的回答来判断, 当回答为肯定时记为 1, 否则为 0。“农地转出面积”表示农户转出农地的面积, 用于衡量农户在决定转出农地后的转出规模。同时, 本文用“是否领取养老金”和“养老金收入”两个变量分别代理农户的养老金实际领取情况和养老金收入水平。“是否领取养老金”的测度是由户主对 CRHPS 问卷中关于“去年是否领取过新农保 (城居保或城乡居保)”的回答进行判断, 当回答为肯定时记为 1, 否则记为 0。“养老金收入”则由户主对问卷中“去年平均每个月领取了多少养老金?”的回答得出, 若农户尚未开始领取养老金, 则将该变量赋值为 0。

2. 识别变量。基于前文提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受益标准, 本文选取了相应的年龄指标作为领取不同类型养老金的识别变量。“户主年龄”作为识别变量被定义为 2019 年时户主的实际年龄, 即 2019 减去问卷中记录的户主出生年份, 当然年龄变量会随着使用数据年份的不同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新农保制度改革实现县域全覆盖的 2012 年计算, 当年已满 60 岁的农户可以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 转换至 2019 年时对应的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年龄就应为 67 岁。在后文的基准结果分析中, 识别变量将以 60 岁断点和 67 岁断点分别代表领取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年龄和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年龄。

3. 控制变量。参照现有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流转影响的研究 (例如徐志刚等, 2018; 钱文荣等, 2022), 本文还设置了家庭和户主个人层面的若干控制变量。其中: 家庭层面的变量包括“宅基地情况”“农地承包规模”“转移支付”“流动性约束”“收入状况”, 以及用于描述户内家庭成员状况的“家人健康”“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力数量”“子女数量”“婚姻状况”; 户主层面的变量则包括“商业保险”“是否为党员”“健康状况”。这些控制变量分别用于识别农户的土地资源禀赋、家庭收入状况、农业生产状况、家庭成员状况, 以及户主个人的参保行为、健康状况等。

表 2 展示了上述变量的具体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因变量“是否转出农地”的均值为 0.23, 意味着在本文的样本中有 23% 的农村家庭转出了农地; “农地转出面积”变量的统计显示, 在有农地转出的家庭中, 其平均转出面积为 4.82 亩。核心自变量“是否领取养老金”的均值为 0.44, 说明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 有 44% 的户主实际领取到了养老金; “养老金收入”变量的均值为 80.30, 计算后得到月均养老金收入为 182.50 元^①,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仍然较低。在识别变量层面, 为确保因果识别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在参照了现有运用断点识别策略的实证研究后, 本文将“户主年龄”的

^①计算过程为: 样本量乘以领取均值再除以领取人数, 即 $(7514 \times 80.30) / (7514 \times 0.44) = 182.50$ 。

取值范围限定在 54~73 岁。同时为了识别的准确性，本文还剔除了位于断点处的样本。最终得到 3 个年龄区间用以区分不同的养老金领取状态。其中：54~59 岁是尚未领取养老金的样本，61~66 岁是领取了缴费型养老金的样本^①，68~73 岁则是领取了非缴费型养老金的样本。

表 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是否转出农地	2018 年时是否转出了农地：是=1，否=0	7514	0.23	0.42
农地转出面积	2018 年时转出农地面积（亩），只包含了转出农地的子样本	1741	4.82	5.54
核心自变量				
是否领取养老金	2018 年时是否领取到养老金：是=1，否=0	7514	0.44	0.50
养老金收入	户主在 2018 年时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收入（元），若尚未领取养老金，则取值为 0	7514	80.30	230.58
识别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岁）	7514	62.57	5.84
控制变量				
宅基地情况	家庭有无宅基地：是=1，否=0	7514	0.89	0.31
农地承包规模	家庭承包地面积（亩）	7514	7.48	7.96
转移支付	家庭是否接受过转移支付：是=1，否=0	7514	0.19	0.40
流动性约束	家庭拥有的现金金额（元）	7514	4542.09	18065.91
收入状况	2018 年时的家庭收入总额（元）	7514	44910.53	89327.90
家人健康	除户主外，户内是否有非常不健康的家庭成员：是=1，否=0	7514	0.16	0.37
家庭总人口	家庭中生活在一起的人数（人）	7514	3.03	1.72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中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的劳动力数量（人）	7514	2.62	1.17
子女数量	生活在一起的子女数量（人）	7514	0.46	0.68
婚姻状况	户主是否和配偶共同居住：是=1，否=0	7514	0.88	0.33
商业保险	户主是否参保了商业保险：是=1，否=0	7514	0.04	0.20
是否为党员	户主是否为中共党员：是=1，否=0	7242	0.14	0.35
健康状况	户主的自评健康状况：非常不健康=5，不健康=4，一般=3，健康=2，非常健康=1	7514	2.97	1.04

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看，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中有 89% 的农户拥有宅基地，户均承包地规模为 7.48 亩，19% 的家庭接受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农户的现金储备均值为 4542.09 元，2018 年的家庭总收入均值为 44910.53 元。在家庭劳动力资源禀赋层面，家人中有健康问题的农户占比为 16%，有 88% 的户主与其配偶同住，户均人口为 3.03 人，其中劳动力数量的均值为 2.62 人，居住在一起的子女数量

^①2019 年距政策试点开始时间仍不满 15 年。因此，该部分样本实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缴人群，但这并不改变其作为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受益人的分析基础。

仅为 0.46 人。户主中只有 4% 购买了商业保险、14% 为中共党员，户主的平均自评健康状况介于健康和一般。

（三）实证模型设计

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个体年龄决定着其领取的养老金收入是非缴费型还是缴费型，而年龄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意味着该变量会与面板数据或混合截面数据分析中所使用的时间固定效应产生完全共线性（李增福等，2022）。参照已有研究对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识别策略（例如 Huang and Zhang, 2021; Zhu et al., 2022），本文使用了断点回归设计以识别不同类型的养老金收入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将基于 2019 年截面数据展开，因此在相应的识别策略中，60 岁可以作为区分是否有资格领取缴费型养老金的断点，而 67 岁可以作为区分领取缴费型养老金与非缴费型养老金的断点（见图 2 的阶段 A）。在没有其他外生冲击影响的前提下，断点回归方法可以在断点附近得到一个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的无偏估计量，从而检验本文所提出的两项假说。因农地转出决策是一个家庭层面指标，而年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是个人层面指标，考虑到户主在家庭农业生产决策中的核心作用（黄毅祥等，2023），本文将户主特征作为整体家庭特征的代表。本文的断点回归估计模型如下：

$$Landout_i = \alpha + \theta Qualify_i + W_i b + \mu_i \quad (1)$$

（1）式中， $Landout_i$ 表示第 i 个农户是否转出农地或农地转出的面积， $Qualify_i$ 对应了第 i 个农户是否具有缴费型养老金领取资格或非缴费型养老金领取资格，在本文中户主年龄是否大于 60 岁或大于 67 岁为代理变量。 W_i 是本文设置的控制变量向量，在分析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对农地转出影响的机制时，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农户的实际养老金领取状况，即“养老金收入”变量^①。另外， α 表示截距项， θ 表示农户的缴费型或非缴费型养老金领取资格对农地转出或转出面积的估计系数， b 表示对应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的向量， μ_i 则是模型的残差项。

并不是所有达到领取门槛年龄的老年人都可以拿到相应的养老金收入，因此本文采取了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中所使用的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该方法可以充分利用政策的外生性进行因果推断，通过限制带宽还可以减少遗漏变量对计量结果的干扰，得到的估计结果是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决策的意向性估计（Intention to Treat, 简称 ITT）效应和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简称 LATE），两者都能部分处理断点回归估计结果外推能力不足的问题（Kisbu-Sakarya et al., 2018）。年龄作为本文重要的识别变量，同样会对农地转出决策产生影响，但若将年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则会产生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使模型无法得出有效的估计结果。因此，在参照了已有研究的模型设置后（Zhu et al., 2022），本文在涉及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的计量模型中添加了户主年龄与断点识别年龄相关的控制变量，以平滑年龄趋势在模型中的影响。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①考虑到缴费型养老金领取资格、实际的养老金领取状况与实际的养老金收入可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在估计缴费型养老金领取资格对农地转出的影响以及第一阶段回归估计时，未将“养老金收入”变量纳入模型。

$$\widehat{NRPS}_i = \alpha_1 + \beta_1 Qualify_i + Age_i h_1 + W_i b_1 + C_i + \varepsilon_{1,i} \quad (2)$$

$$Landout_i = \alpha_2 + \beta_2 Qualify_i + Age_i h_2 + W_i b_2 + C_i + \varepsilon_{2,i} \quad (3)$$

$$Landout_i = \alpha_3 + \beta_3 \widehat{NRPS}_i + Age_i h_3 + W_i b_3 + C_i + \varepsilon_{3,i} \quad (4)$$

其中，(2)式为第一阶段估计模型，(3)式为ITT估计模型，(4)式为LATE估计模型。以上3个公式中， $NRPS_i$ 表示农户*i*是否领取了养老金， \widehat{NRPS}_i 是根据领取不同类型的养老金资格得到的估计量， Age_i 则是用于平滑断点前后年龄趋势的控制变量向量。 C_i 是不可观测的村庄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与地理人文因素相关的变量。 α 为模型的截距项， β 、 h 和 b 为对应变量的估计系数， ε 为残差项。其余符号含义与(1)式一致。

模糊断点回归方法是否适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存在着两大技术性假设前提：其一，样本在断点处不应被人为操纵；其二，控制变量不应受断点影响(McCrary, 2008)。通过对样本年龄分布状况的判断，本文发现，在断点附近不存在异常集聚问题，说明数据在断点附近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较低。本文的所有控制变量在两处断点周围也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变化^①，可以认为控制变量并不受断点所代表的政策影响，消除了控制变量与识别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综上所述，本文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进行识别分析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对不同年龄段与不同养老保险方案关系的分析，在2012年时达到领取养老金门槛年龄，即当年已满60岁的老年人，参与的是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而2012年后达到领取门槛年龄的老年人，参与的是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鉴于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是2019年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区分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与缴费型养老金的断点年龄应为67岁，而区分领取缴费型养老金与尚未开始领取的断点年龄应为60岁。

图3展示了养老保险变量在60岁与67岁的断点估计结果。在60岁断点处，“是否领取养老金”和“养老金收入”都有明显的跃升，领取养老金的概率从60岁前的不足10%变化为60岁后的60%，领取金额也从每月约25元提升至每月150元左右；而在67岁附近，领取养老金的概率和金额都有小幅下降，但断点现象并不明显。从图3的结果看，只有领取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在领取概率和金额上存在明显的年龄断点，而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并不存在对应的年龄断点。这说明，在当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与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在覆盖率和保障水平等层面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①由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在60岁与67岁的断点估计结果未在此处报告，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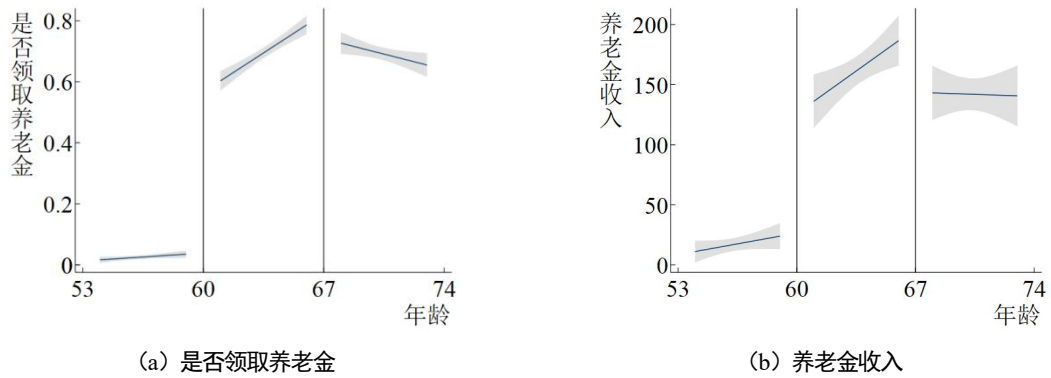


图3 养老保险变量在60岁与67岁的断点估计

注：阴影部分表示参数的95%置信区间。

图4展示了“是否转出农地”和“农地转出面积”变量在60岁与67岁的断点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户主年龄在67岁前后的农地转出概率变化要比户主年龄在60岁前后的转出概率变化更加明显，两者置信区间的重叠程度更低，且农地转出概率在3个年龄区间分别呈现下降、保持和上升的变化趋势。农地转出概率在67岁断点附近的跳跃现象说明，除了户主年龄因素外，还存在其他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因素，其中可能就有67岁断点所代表的不同心理账户的原因：拥有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相对于拥有领取缴费型养老金资格更能促进农户作出转出农地的决策。而对于选择转出农地的农户来说，其转出面积在60岁和67岁断点附近均不存在明显的跳跃现象，说明当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心理账户并不能进一步地影响农户的转出规模决策。当然，这一现象也可能与样本量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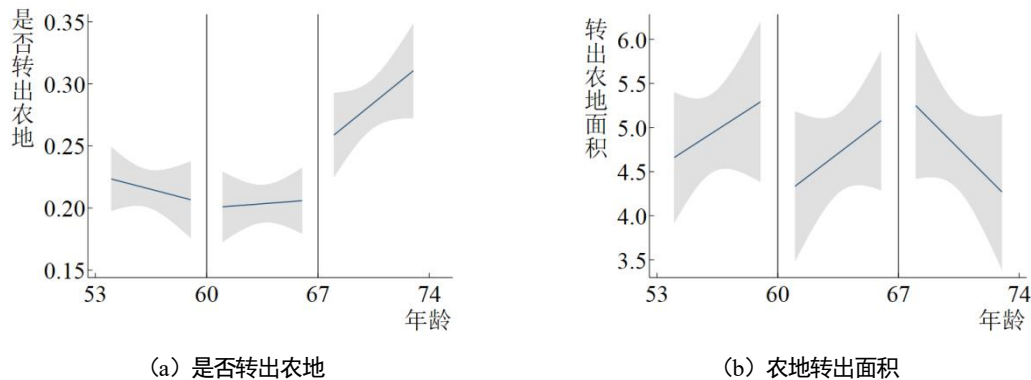


图4 农地转出变量在60岁与67岁的断点估计

注：阴影部分表示参数的95%置信区间。

表3展示了不同年龄区间对养老金领取概率、转出农地概率和农地转出规模的影响。为处理户主实际年龄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对年龄指标的处理方法，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户主年龄与缴费型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年龄的差值及其平方项，用以平滑断点前后的年龄趋势，尽可能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从表中(2)列和(4)列的估计结果看，更年轻的户主能领取到养老金的概率会比处于61~66岁年龄的户主低60.3%，而农地转出概率未见显著差异；更年长的户主领取养老金的概率

要比 61~66 岁年龄的户主低 7.6%，但转出农地的概率要高 4.4%。表 3（6）列的结果显示，在作出转出决策的农户中，转出农地的面积不受户主年龄区间的影响。以上结果初步说明户主拥有领取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并不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而拥有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会促进农地转出，但对农户的转出规模不产生显著影响。

表 3 不同年龄组别对养老金领取和农地转出影响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变量	是否领取养老金		是否转出农地		农地转出面积（对数）	
	(1)	(2)	(3)	(4)	(5)	(6)
年龄在 54~59 岁	-0.598*** (0.024)	-0.603*** (0.025)	0.025 (0.023)	0.027 (0.023)	0.081 (0.073)	0.027 (0.063)
年龄在 68~73 岁	-0.084*** (0.022)	-0.076*** (0.023)	0.049** (0.023)	0.044* (0.023)	-0.049 (0.069)	-0.026 (0.057)
户主年龄	0.012*** (0.003)	0.011***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5 (0.009)	0.004 (0.007)
村庄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7366	7098	7366	7098	1410	1358
调整后的 R ²	0.473	0.474	0.208	0.218	0.523	0.672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本表对对照组为年龄区间在 61~66 岁的样本。③括号内汇报了聚类于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④控制变量包含前文提及的 13 个控制变量，不包括“养老金收入”变量。

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养老金收入与农地转出决策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对 60 岁与 67 岁断点进行了 ITT 和 LATE 分析。表 4 展示了“是否转出农地”与“农地转出面积”变量在 60 岁断点处的回归估计结果，意在检验户主拥有领取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可以明显看出，户主是否大于 60 岁只会显著影响养老金的实际领取概率，并不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这验证了假说 H1，即在同一心理账户内，缴费型养老金不会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功能的替代关系可能并不成立。表 4（2）列展示了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年龄大于 60 岁的户主实际能领取到养老金的概率要比未满 60 岁的高 68.8%，说明年龄变量可以作为 LATE 分析中的工具变量来代理实际的领取养老金情况。表中（5）列和（6）列汇报的第一阶段 F 值也均大于 300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但因 ITT 分析中 60 岁断点对“是否转出农地”和“农地转出面积”的估计均不显著，使得 LATE 分析也无法得出显著的结果。

表 4 领取缴费型养老金对是否转出农地与农地转出面积的影响估计：对 60 岁断点的回归

变量	第一阶段 是否领取养老金		ITT 是否转出农地		LATE 是否转出农地	
	(1)	(2)	(3)	(4)	(5)	(6)
是否大于 60 岁	0.688*** (0.012)	0.688*** (0.012)	0.001 (0.011)	-0.001 (0.011)		

表 4 (续)

是否领取养老金(是否大于 60 岁为工具变量)					0.001 (0.016)	-0.002 (0.016)
观测值	5380	5195	5380	5195	5380	5195
第一阶段 F 值					3651.460	3299.238
调整后的 R ²	0.532	0.534	0.216	0.222		
变量			ITT 农地转出面积(对数)		LATE 农地转出面积(对数)	
			(7)	(8)	(9)	(10)
是否大于 60 岁			-0.048 (0.038)	-0.010 (0.035)		
是否领取养老金(是否大于 60 岁为工具变量)					-0.077 (0.062)	0.016 (0.056)
观测值			848	817	848	817
第一阶段 F 值					422.736	362.468
调整后的 R ²			0.540	0.670		
年龄相关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注: 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表中的回归只包含年龄区间在 54~59 岁和 61~66 岁的样本。③括号内汇报了聚类于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④控制变量包含前文提及的 13 个控制变量, 不包括“养老金收入”变量。⑤年龄相关变量定义为户主在样本年份的实际年龄与领取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年龄之差及其平方项, 以控制断点前后的年龄趋势。

表 5 关注了以 67 岁断点为代表的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对农地转出的影响。从表 5 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户主相较于领取缴费型养老金的户主在实际领取概率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表中(4)列的 ITT 估计结果显示, 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会促使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提高约 6.2%, 且估计结果在 1% 水平上显著。但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对农户的农地转出面积没有显著影响。因第一阶段估计结果不显著, 对 67 岁断点的 LATE 分析也不存在统计显著性。虽然对农地转出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但对 67 岁断点的 ITT 估计结果也可以证明本文提出的假说 H2 是成立的, 即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下, 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比领取缴费型养老金更能促进农户作出农地转出的决策。

表 5 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对是否转出农地与农地转出面积的影响估计: 对 67 岁断点的回归

变量	第一阶段 是否领取养老金		ITT 是否转出农地		LATE 是否转出农地	
	(1)	(2)	(3)	(4)	(5)	(6)
是否大于 67 岁	-0.009 (0.014)	-0.005 (0.015)	0.075*** (0.013)	0.062*** (0.013)		

表 5 (续)

是否领取养老金(是否大于 67 岁为工具变量)					-8.319 (13.475)	-10.541 (27.189)
观测值	4537	4364	4537	4364	4537	4364
第一阶段 F 值					0.391	0.153
调整后的 R ²	0.130	0.131	0.193	0.207		
变量			ITT		LATE	
			农地转出面积 (对数)		农地转出面积 (对数)	
			(7)	(8)	(9)	(10)
是否大于 67 岁			-0.016 (0.041)	0.016 (0.038)		
是否领取养老金(是否大于 67 岁为工具变量)					-0.305 (0.762)	0.257 (0.641)
观测值			834	800	834	800
第一阶段 F 值					2.061	2.571
调整后的 R ²			0.485	0.653		
年龄相关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注：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表中的回归只包含年龄区间在 61~66 岁和 68~73 岁的样本。③括号内汇报了聚类于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④控制变量包含前文提及的 13 个控制变量，不包括“养老金收入”变量。⑤年龄相关变量定义为户主在样本年份的实际年龄与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年龄之差及其平方项，以控制断点前后的年龄趋势。

(二) 机制分析

在初步验证了假说 H1 和 H2 后,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为何会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部分的推理,非缴费型与缴费型养老金受益人在行为决策上出现分化的原因是始于 2012 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当年是否年满 60 岁成为区分标准。在该标准下,不同类型的养老金收入被计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又通过不同的心理账户影响农户的行为决策。结合 CRHPS 数据库的调查时间特征,本文选取了 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的截面数据做进一步研究,以分析政策冲击后的不同时点上,心理账户如何影响农户的行为决策。

因 CRHPS 数据库中缺少可直接定义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指标,表 6 展示的回归结果只能以前文的 ITT 模型为基准。模型中的自变量“是否有资格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被定义为户主在 2012 年时是否已经达到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门槛年龄,若 2012 年时已年满 60 岁,则记为 1,否则为 0。在 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的模型中,“是否有资格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门槛年龄分别对应为 63 岁、65 岁和 67 岁。用“是否有资格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代理实际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领取状况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数据限制的情况下,该变量也有其作为实证研究关键变量的合理性。首先,该变量与实际领取状况有较强关联性,只有达到领取条件中规定的门槛年龄,才有资格领取非缴

费型养老金；其次，该变量相较于实际领取状况，在问卷中更容易得到识别，且数据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更低；最后，在无法准确测度实际的非缴费型养老金领取情况下，该变量的设置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能更好地控制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表 6 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对农地转出影响的逐年回归估计

变量	因变量：是否转出农地		
	(1)	(2)	(3)
是否有资格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	-0.010 (0.021)	0.035** (0.016)	0.062*** (0.013)
相关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213	3150	4341
调整后的 R ²	0.190	0.141	0.209
样本年份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表中的回归只包含年龄区间在 61~66 岁和 68~73 岁的样本。③括号内汇报了聚类于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④篇幅所限，“相关控制变量”包括“养老金收入”“年龄相关变量”“村庄固定效应”和前文提及的“控制变量”。⑤是否有资格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定义为户主在 2012 年时是否已年满 60 岁。

从表 6 的估计结果看，在控制了户主“年龄相关变量”后，2019 年时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会促使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提高约 6.2%。2017 年“是否有资格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估计系数表明，户主拥有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在 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能促使农户农地转出概率提升 3.5%。但 2015 年时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对农地转出不存在显著作用。

逐年提升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与样本量不断扩大、政策执行规范性不断提升有关，更与政策带来的心理因素变化相关。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相同数额的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被计入不同心理账户所带来的不同心理收益冲击也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逐年地、不间断地发放非缴费型养老金必然会给参与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的农户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收入预期，而农户的主观心理预期会显著影响其农地转出决策（徐志刚等，2018）。在缴费型与非缴费型养老金领取金额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基础上，稳定的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能产生更大的心理收益冲击，从而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这也解释了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微薄”的养老金收入为何能对农户行为决策产生显著影响：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这一“临时”的制度安排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养老收入预期，其中带来的巨大心理收益冲击能促使农地转出的发生概率得到显著提升。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断点分析、基准回归和逐年回归都证明了领取缴费型养老金不会改变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而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能促使农户转出农地。但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 LATE 估计和 ITT 模型都严重依赖于模型设置中的带宽选择，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对基准结果中的户主年龄变量进行了缩小带宽处理，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对是否转出农地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缩小带宽

变量	因变量：是否转出农地				
	(1)	(2)	(3)	(4)	(5)
带宽（年龄区间）	60~74	61~73	62~72	63~71	64~70
是否有资格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	0.062*** (0.013)	0.056*** (0.014)	0.053*** (0.017)	0.057** (0.020)	0.078*** (0.029)
相关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4341	3720	3031	2300	1339
调整后的 R ²	0.209	0.205	0.188	0.186	0.160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汇报了聚类于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篇幅所限，“相关控制变量”包括“养老金收入”“年龄相关变量”“村庄固定效应”和前文提及的“控制变量”。

表 7 中（1）列至（5）列的年龄区间逐渐缩小，但“是否有资格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均维持在较强的水平，各模型估计得到的经济意义表明，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能促使农地转出概率提升约 5.0%~8.0%，且结果较为稳健。（5）列的估计结果还显示，在带宽最小的区间，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对是否转出农地影响的估计系数最大，说明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心理账户作用在越靠近 67 岁的断点处越明显。以上结果说明，以户主年龄是否已满 67 岁代理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在模型的识别策略中是成立的，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心理账户理论构建了一个用于解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影响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在实证分析层面，本文使用了浙江大学 CRHPS 截面数据，并利用年龄变量在政策受益条件中的不连续性特点，以断点回归识别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因果关系，并对这一影响的 ITT 和 LATE 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类型的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分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会对农户的行为决策产生不同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缴费方式的差异导致农户在接受相同金额的养老金收入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收益冲击。正如 Thaler（1985）在解释心理账户的示例中所述，若不是因渔获运输损失而得到了等价的赔偿，外出打鱼的两对夫妇并不会用劳动所得去享用大餐，说明同样金额但不同的收入性质会使人们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同理，农户在面对需要缴费才能获得的养老金收入和不需要缴费就能获得的同样金额收入时，因两类收入被计入不同的心理账户，不同类型的养老金收入会对农户的行为决策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第二，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相比于领取缴费型养老金更能促使农户转出农地。通过 ITT 和 LATE 分析年龄断点前后的农地转出概率和农地转出规模，本文发现领取缴费型养老金对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和转出面积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能促使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提升约 6.2%，该结

果与现有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例如徐志刚等，2018；Zhu et al., 2022）。本文的结果说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可能源自其中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部分，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缴费型保险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并没有影响，这也解释了该研究议题产生争论的原因。

第三，非缴费型养老保险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会随着该项方案的持续执行而得到提升。本文通过对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CRHPS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初期，领取非缴费型与缴费型养老金在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随着政策持续稳定的执行，非缴费型与缴费型养老金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才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区别。这说明，政府逐年地、不间断地发放非缴费型养老金会给参与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的农户提供更加稳定的养老收入预期，相较于将缴费型养老金计入投资收入账户的农户，对意外收入账户的稳定预期更能推动农户转出农地。这也解释了在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微薄”的养老金收入为何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行为人的心理作用是推动农地转出的关键，而养老金的收入效应不是。

当然，本文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需要改进：其一是对影响农地流转的分析视角存在不足。基于年龄指标来选取样本框有利于本文因果识别的展开，但受制于这一方法，本文无法在同一样本框下对其他诸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多元救助制度等影响农民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项目进行实证分析。其二是实证分析中，用户主年龄变量来代理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资格的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大型数据库在设置调查问卷时还未考虑个体经济决策背后的心理因素，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不同收入类型又难以通过问卷获取。受制于此，本文只能以年龄指标来测度相关变量，通过控制与年龄相关的其他变量来尽可能缓解实证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未来还需通过开展专业性的调查研究、优化计量模型设计等方法来进一步完善。

（二）政策启示

在农村土地细碎化、农地撂荒等问题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下，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和所采用的研究视角有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在已有政策的优化层面：在稳定非缴费型养老金发放政策的同时，应适当提高其中的政府补贴水平，以促使老年农户转出农地。本文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微薄”的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也能有效促进农地转出，且农地转出的发生概率会随着农户对未来领取非缴费型养老金收入的稳定预期而逐步提高。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在持续实施非缴费型养老金发放政策的同时，通过提高现行的补贴水平，或者以宣传形式增强老年人对未来社会养老保险可得收入的预期，使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这一“临时性”制度安排持续提升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

第二，在新政策的制定层面：为促进农地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手中转出，建议有针对性出台“高补贴”的社会保险政策。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常规性的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并不能促进农户转出农地，而政府无条件转移支付的非缴费型养老保险方案能发挥显著作用。因此，针对不利于农地资源有效配置的人群，政府可以出台保障其就业和养老待遇的“高补贴”社会保险政策，通过精准识别来控制保险项目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同时达到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第三,在未来政策的研究层面:为更科学地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相关政策建议,可以运用心理账户等理论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细致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心理账户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机理。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学效用分析理论,心理账户理论的核心是不同来源的收入拥有相互之间不可替代的使用场景标签。换言之,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一项社会福利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还应考虑政策是如何得到执行、受益人是通过何种方式享受到政策红利的,因为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收益冲击,这种冲击则会直接影响政策效果。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善用心理账户等理论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分析和判断,通过更丰富的理论分析方法,制定更有效率的政策方案。

参考文献

- 1.黄毅祥、廖芮、赵敏娟,2023:《家庭核心成员健康状况对农户农业生产性资产投资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第126-143页。
- 2.姜长云,2022:《农村土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第49-55页。
- 3.李增福、陈俊杰、连玉君、李铭杰,202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债长用》,《管理世界》第1期,第77-89页、第143页、第90-101页。
- 4.钱文荣、洪甘霖、郑淋议,2022:《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基于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视角》,《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第4-18页。
- 5.汪险生、李宁、胡平峰、金晶,2022:《公共养老能替代土地养老吗——来自“新农保”影响农地租出的经验证据》,《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第124-143页。
- 6.徐志刚、宁可、钟甫宁、纪月清,2018:《新农保与农地转出:制度性养老能替代土地养老吗?——基于家庭人口结构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管理世界》第5期,第86-97页、第180页。
- 7.薛惠元、仙蜜花,201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地区差距研究——基于东中西部8个新农保试点县的比较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第1期,第72-76页。
- 8.郑秉文,2020:《非缴费型养老金:“艾伦条件”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与改革出路》,《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2-18页。
- 9.郑沃林、曹壹帆、邹宝玲,2022:《心理账户视角下农地流转不畅的机理解释及其再造机制探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93-201页。
- 10.Becker, G.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75: 493-517.
- 11.Huang, W., and C. Zhang, 2021, “The Power of Social Pen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3(2): 179-205.
- 12.Kisbu-Sakarya, Y., T. D. Cook, Y. Tang, and M. H. Clark, 2018, “Comparativ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 Stress Test with Small Samples”, *Evaluation Review*, 42(1): 111-143.
- 13.McCrary, J., 2008, “Manipulation of the Running Variable in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 Density Test”,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2(2): 698-714.

14. Qian, W., 2019, *Socie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149-152.
15. Thaler, R. H., 1985, "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 *Marketing Science*, 4(3): 199-214.
16. Thaler, R. H., 1999, "Mental Accounting Matter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2(3): 183-206.
17. Thaler, R. H., and E. J. Johnson, 1990, "Gambling with the House Money and Trying to Break Even: The Effects of Prior Outcomes on Risky Choice", *Management Science*, 36(6): 643-660.
18. Zeng, Y., and T. Herzfeld, 2021, "The Effects of Mental Budgeting on the Intentions to Switch to Low-Toxicity Pesticides: Evidence from Vegetable Farmers in Sichuan, China",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13(3): 528-547.
19. Zhang, W., X. Fu, J. Lu, L. Zhang, K. Michael, G. Liu, F. Yang, and Y. Liu, 2016, "Understanding Farmers' Decision-Making in Agricultural Water Fee Payment in China: The Role of Mental Accounting", *Water*, 8(9), 375; <https://doi.org/10.3390/w8090375>.
20. Zhu, J., S. Jin, Z. Tang, and T. Awokuse, 2022, "The Effect of Pension Income on Land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71(1): 333-371.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责任编辑: 小林)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Pensions on Farmland Out-Transfers: A Perspective from 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HONG Ganlin ZHAO Zongyin QIAN Wenrong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introduce the 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ocial pensions on farmland out-transfers, and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ontributory and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with the 2019 CRHPS data, we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schemes of social pensions on farmland out-transfer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ory pension scheme does not have an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decision to transfer out farmland. While receiving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farmland out-transfers, it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cale of farmland transferred out. Based 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of 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comparing with the income effect of contributory pensions, by stabilizing farmers' expectations of future pension, a relatively low pension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cision of transferring out farmland. The conclusion of our study is that the sub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ensions and the pension function of farmland is not valid, and only the temporary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scheme affects the decision of transferring out farmland. This paper is not only a reexam of the debate on whether there exists a sub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pensions and farmland as pensions, but also a new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ensions on farmers' decision of transferring out farmland based on the 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Keywords: Pensions; Farmland Out-Transfers; Mental Accounting; 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